

# 树立金融投资养老的社会风俗

李涌平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研究提出金融投资养老的概念, 认为金融投资养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投资养老在我国现阶段应该进行广泛的提倡。金融投资养老取代养儿防老有助于计划生育工作。

**关键词:** 金融投资养老; 养儿防老; 社会养老; 个人储蓄; 投资养老组合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0)05-0039-05

## Promoting Social Custom of Supporting the Aged by Monetary Investment

LI Yong-ping

(Population Institut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concept of supporting the aged by monetary investment, indicating t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for family supporting the aged under market economy. It should be widely advocated at present because it is helpful for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by instead of "rearing children for old-age".

**Keywords:** supporting the aged by monetary investment, rearing children for old-age, supporting the aged by society, personal saving, complex of investment for supporting the aged

在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0.9亿,占总人口的7%,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国家之列。人口老龄化是我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结果。按未来平均人口预期寿命涨幅不大的较保守的人口预测,到2020年,

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0%,2040年则会上升到15%。

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999年位居世界第七位(10550亿美元),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位居世界百位之后。中国是一个以较低人均收入并且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老龄化国家俱乐部的。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障压力将在本世纪上半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期。政府、集体和家庭都要对养老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

收稿日期: 2000-04-29

作者简介: 李涌平(1963-),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人口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学。

### 参考文献:

- [1] Calvin. Goldsheier;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 1983. 49-97.
- [2] 苏忠遂. 武汉流动人口与就业问题研究.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向具有切实可行的经营计划及相应能力的流动者提供条件优惠的小额创业信贷资助,为他们创业提供必要的启动资金,并为他们扩大经营规模,提升产业档次创造必要的条件。

投资养老的内涵属于更广泛意义的家庭养老,包括养儿防老、储蓄养老和金融投资养老三个部类。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储蓄养老和金融投资养老。储蓄养老已经是我国现行家庭养老的一种经常性的措施,为很多人所接受。金融投资包括固定资产的投资(例如房地产)和非固定资产的投资(主要有保险和证券)。如果金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养老,那么我们这里就称之为金融投资养老。金融投资养老,是市场经济形势下诞生的新生事物,在我国大众的心目中,既不像养儿防老观念一样根深蒂固,也不像储蓄养老那样广为人知。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投资养老的社会风俗,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宣传和推广金融投资养老。金融投资养老是家庭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本研究认为,这里的投资养老的提法比养儿防老的提法有优点,值得宣传。

### 一、摒弃养儿防老习俗是一种必须

我国的养老保障是通过来自国家和市场的正规系统和来自家庭的非正规系统对老年人口提供的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养儿防老都是家庭养老保障的组成部分。养儿防老作为中国文化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已根深蒂固,但很明显,它不利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国策的贯彻落实。

养儿防老实际上是父母对子女预期回报的一种反映,可以表述为:

$$G1(\text{父母}) \leftarrow \rightarrow G2(\text{子女}) \leftarrow \rightarrow G3(\text{孙子女})$$

其中向右箭头表明对子女的投入,向左箭头表明父母的预期回报。养儿防老为儒家文化特有。同在人口老龄化俱乐部的西方国家,根本不存在父母的预期回报(向左箭头),这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经济很不发达时,父母对子女回报的要求也远没有中国这样高。西方文化对子女的生育投入,更多地对应着个体层次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而中国文化对子女的投入,更多地对应着社会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需要。

如果人口数量每代平衡的话,这种老一代的养老回报要求是成立的。但我国的一孩人口政策打破了这种平衡,形成了众所周知的4-2-1家庭模式。这可表述为:

$$G1(4人) \leftarrow \rightarrow G2(2人) \leftarrow \rightarrow G3(1人)$$

根据简单的人口定量计算,不考虑养育成本的逐年增高和其他经济因素,每个父母的投入,最多只能从

子女那里得到相当于1/2的投入回报。而在生育率下降之前的60年代,每个父母的投入,最多能从子女那里得到相当于2~2.5倍投入的回报。显然,我国已经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老龄人口的上述预期回报影响的大致变化范围是,从正200%~250%到负25%~50%。在低生育阶段,父母抚养子女付出的多,子女回报父母的要少许多。

家庭代际财富流动理论(Wealth-Flow Theory)告诉我们,农业社会中家庭财富从子女流向父母,后农业社会家庭财富从父母流向子女,并预测这种财富流动的变向会导致人们的低生育观念<sup>[1]</sup>。实际上,这一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家庭代际财富流动理论强调了人们家庭活动的经济属性和相应的结果,但多少忽略了家庭观念难以变更的社会属性,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间是宝贵的,这对于有一定预期寿命的人口养老更是这样。为什么投入回报下降了很多,许多人仍持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呢?这多少反映了社会风俗的持久特性。我认为,在一个新的社会风俗没有确定地位之前,旧的社会风俗不可能消失。

另外,未来家庭养老的机会代价(Opportunity Cost)在我国也会很大,成年人必须在照料老年人与追求事业之间作出选择<sup>[2]</sup>。这意味着养儿防老在未来会加大养老的机会代价,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靠子女养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形式下,是不利于家庭资金积累的。

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养儿防老的非经济因素,诸如子女对老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以及社会需求方面的帮助。由于我国的儒家文化传统,这种非经济因素会通过养儿防老的形式继续存在。那么这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否会变化呢?为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我国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过去发展看苏联,现今以后发展看美国”。这种想法虽然忽视了我国特有的国情和传统文化,但有一点是有借鉴作用的,那就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在美国,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的非经济因素帮助和经济帮助一样,都相对较少<sup>[3]</sup>。考虑现有养老的社会观念的可能变化,我们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强调和加强个体独立自主能力(Individualism),这种个体独立自主能力不仅是经济上的(好比给予粮食),更主要的是社会观念上的(好比给予猎

枪)。

## 二、健全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但还不够

1997年在国有企业中,我国开始实行新的养老金制度;1999年在非国有企业强制实行新的养老金制度。企业为员工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每月,工人和雇主双方支付保险金。但对于1997年之前退休和受雇的工人,新的养老金制度中出现了一些漏洞。其他问题还包括所收集的养老金的科学使用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问题为新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根据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字,为平衡1999年养老金预算而实行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导致了高达1千亿元的赤字。乐观的估计,我国政府至少需要1.8千亿元人民币偿还旧养老制度下所欠的债务。显然,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国城市养老制度将面临严重威胁。为偿还养老金,我国政府正在清理国有资产<sup>[4]</sup>,以解决目前养老金短缺困难。清理国有资产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赎回上市公司中的国家持有股份,对以前免费使用的土地进行收费等。社会养老保险变革的效果如何,人们还拭目以待。

根据今年4月全国城镇工作会议提供的数据,我国现有69.1%的农业人口,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快速进行<sup>[5]</sup>。农业人口养老保障的发展是我国整个养老体制的重要问题。我国于1992年在农村开始实行养老金制度,但效果不明显。关键的问题是,有关上缴的养老金的使用和升值的规定没能配套进行。只向农民收钱而不清楚地告诉农民如何管理和使用这笔养老资金是不科学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机制相对落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界农产品的大量进口,会对农民家庭收入产生强烈冲击。但这同时也产生了机遇,那就是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会加快,农转非力度也会加大。这会有益于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体制的实施。

社会代际财富分配理论(Pay-as-you-go Theory)告诉我们,在后农业社会中通过税收和养老金的发放,来分配社会财富,从而平衡一个时期(通常为一年)的社会所需<sup>[6]</sup>。实际上,这一理论或体系成立的前提是人口出生队列变化不大,当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老年抚养系数增长较快时,这一理论或体系无疑逐步加大了劳动力的负担,这时,社会代际财富分配不但不能达成社会所需目的,还可能导致社会供给下降。根据我国国情,冯立天教授<sup>[7]</sup>对社会代际财富分配理论进行了修整,提出了社会

财富返还理论。社会财富返还理论认为国家应该对经济改革过渡时期的老龄人口进行社会财富返还,因为只有这种返还才能体现改革过渡时期的老龄人口在非市场经济下的贡献。社会财富返还说明了劳动力人口对老龄人口的抚养不单纯是社会义务,更是老龄人口对过去付出的理所当然的回报所求。财富返还无疑从理论上正确地论述了我国的社会养老国情,但遗憾的是社会财富返还理论和社会代际财富分配理论一样,都没能清楚地说明我国对老龄人口抚养(或返还)的整体较弱的经济能力和非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迅速提高,以及预期未来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社会养老会逐渐实现理想定位。这种想法有正确的一面,至少对社会养老在理论上给予希望,但这种想法过于宏观和多少有脱离人口现实之嫌疑,因为我们必须考虑近期会迅速上升的退休老龄人口、自身逐渐增长的老龄人口,以及缓慢增长的人口老年抚养系数。为此,许多学者提出了提高人口退休年龄等具体措施。不过,这些措施的利弊还需要详尽的科学论证。

## 三、金融投资养老应该是现代家庭生活的重要支出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养老。进入21世纪,我们靠国家、靠集体、靠子女养老都有一定的来自社会和经济变化的风险,而且这些也都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在自己年轻时(15~60岁)准备一份未来(60岁以上)使用的养老金。本研究认为,这种个人金融投资养老是对其他养老形式的必要补充或代替,更是把养老问题市场化的一种尝试。实际上,投资养老是人口投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按人口投资的积累和消费理论<sup>[8]</sup>,投资养老有利于人口的正常经济活动。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新的金融投资领域不断开辟,人民的金融意识日渐增强。我国金融状况的市场化和理性化为人们手中的资产保值和增值提供了各种选择的机会。现行的市场经济为以家庭为主的个人投资养老提供了可能。

我国有很高的个人储蓄。个人储蓄已从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2.2万亿元增长到2000年初的6.1万亿元,年增长率高达23.3%。这种高额储蓄的使用目的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首先,

高额储蓄表明了部分东方的传统“有钱须存”心态，这种心态在日本也存在。在我国现阶段，一些人投资意识相对薄弱，已习惯于将钱存入银行；另一些人对风险看得较重，认为银行较证券市场等保险；更有一些人对我国的金融信贷体制还存有一些疑虑。这些都是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其次，高储蓄反映了人们对改革深化的预期，随着我国医疗、住房、养老等制度改革措施的出台，人们认识到一定的储蓄必不可少，一定的储蓄可以应付那些不可预料的支出。另外，我国传统的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意味着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未来子女教育投入也将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我国的高个人储蓄为以家庭为主的个人投资养老提供了条件。

从社会学角度讲，家庭是养老的最小单元。养儿防老是传统社会机制和社会变化的结果。金融投资养老是市场经济机制发展和后工业化社会稳定家庭作用的产物。金融投资养老作为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新形式和观念，需要时间的考验和空间的扩散。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有必要推动这一社会化过程。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变化为选择金融投资养老提供了理论保证。

人口学的生命周期储蓄理论 (Theory of Cohort Saving) 对养老也有很好的解释。首先，我国的低生育率无疑有助于增加家庭储蓄，这是因为低生育率意味着相对较少的少年抚养人口由劳动年龄人口来负担。其次，相对于生命周期的变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变化是缓慢的，这为家庭养老储蓄在时间上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在家庭老年抚养人口负担还不显著时，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对较低消费的同时，提高储蓄积累以满足自己未来养老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和家庭代际财富流动理论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中，决策者是家庭而不是国家，为此家庭会减轻国家决策负担。家庭的决策自主权需要合理地体现在正确判断现在和未来的供给和需求。第二，生命周期储蓄理论是人口出生队列之内而非人口出生队列之间的财富移动理论。人口队列之内的财富移动不直接受人口队列规模影响，而是通过人口队列相对收入变化<sup>9</sup>间接地受队列规模的影响，所以队列规模对生命周期储蓄的影响是很小的。显然，生命周期储蓄更能保证队列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和可接受性。遗憾的是，90年代中以来，我国政府为了发展健全的市场金融体制和为了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需求，多次进

行了降息。现今的银行利息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很难改变。家庭储蓄作为养老的一种手段，理论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每个人的经济行为都应服从经济效益最佳化原则，这是经济分析的假设，也是社会有序正常发展的前提。作为投资养老的一部分，养儿防老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不满足经济效益最佳化原则。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一方面告诉人们投资养老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让人们知道怎样平衡地组合不同的投资养老，以满足经济效益最佳化原则。这种家庭经济决策分析提供了金融投资养老的理论基础。

储蓄、消费、投资是以家庭为主的个人经济行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地进行养老投资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储蓄的增加显然是人们心理稳定，消费趋向有所选择，理性思维有所进步的表现。但这种心态还多少有不成熟的成份。首先，我国的储蓄利率在1999~2000年已经非常低，储蓄保值作用已不明显，考虑价格因素储蓄已显然不可能有增值作用。加之，1999年11月以来实行的利息征税，储蓄不应该再成为家庭经济行为中理性投资的重点。储蓄的传统社会风俗，有必要根据市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教育消费是影响投资养老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应该快速地建立起与中专、大专、大学教育相适应的教育金融信贷体制，使得学生可以用自己未来的钱来保证完成学业。只有这样才可能把父母从对未来子女教育投资的困惑中解放出来，才可能使家庭资源向有利于家庭投资养老领域倾斜。可喜的是，我国一些银行已在几所大学进行着非常成功的试点，新教育金融信贷体制的实施指日可待。

住房消费，其实质是一种固定资产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老龄时成为养老的保证。目前有关住房改革和未来养老联系的研究已经开始，我们希望未来研究能和投资养老相结合，但我们更希望通过研究使相关的政策出台，以保证住房消费是一种有市场意义的固定资产投资。

看起来，鼓励金融投资养老的症结在于宣传金融投资养老这一利国利民的现代观念。为此我们有必要把金融投资养老作为一种社会风俗进行广泛的

倡导。

市场经济下,家庭应该重视金融投资,选择合理的金融投资结构是很重要的。投资养老要兼顾风险和利润。高利润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意味着低利润。储蓄是一种安全但利润很低的资产保值手段,相反证券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利润的资产增值手段。参照发达国家的情况,这里给出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养老组合,供参考。

(1)安全投资养老型:66.7%银行储蓄,33.3%养老保险;

(2)平衡投资养老型:33.3%银行储蓄,33.3%养老保险,33.3%证券投资;

(3)风险投资养老型:33.3%银行储蓄,66.7%证券投资。

马克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表明,分散化或混合的资产结构会减少投资风险并在不确定因素很多的投资环境下可达到高收益<sup>[10]</sup>。根据这种观点,上述推荐的平衡投资养老型,对众多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就个体而言,家庭选择低风险或高风险的投资,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讲,只反映了一种偏好,没有好与坏之分。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青年人更有年龄资本可以进行适当的高风险投资;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整体社会的进步多少是风险投资的结果。另外需要澄清的是,这里的证券投资需要广义的理解,它包括国家债券、基金投资(特别是养老基金投资)、企业内部股份参与、期货交易,以及证券市场的股票投资。

证券投资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环节。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我国国民经济正在以每年约8%增长率的速度高速发展,证券投资的前景是很光明的。金融养老投资和证券投资都是对未来的投资,把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是人口经济学的需要,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遗憾的是,现在我国很多人对证券投资有着错误的理解,把证券投资和赌博或投机联系起来。赌博是一种总和为零的游戏,而证券投资是对一个上市公司前景的预期,总和不为零,一般大于零。虽然我国证券市场现阶段还存在着一定的投机现象,但这种投机现象会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建设的完善而消逝。

曾几何时,我们讥笑那些有小农意识的人,这些人宁愿把钱藏放在家里也不把钱存入银行;时代在发展,金融观念也在更新,我们不应该死守银行储蓄,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证券投资。

展望未来,通过金融养老投资的高收益,老年人会依靠老年公寓,养老院等社会设施自助自立地养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对养老的经济投入,社会养老设施的完善配套和服务人员的专业化,会使我国老年人进入“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的幸福天堂。

#### 四、小结

养儿防老,在经济学意义上已不可能有太大收益,但在社会学意义上仍然有不可低估的抗逆性。摒弃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树立金融投资养老的新社会风俗,是人口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金融投资养老应该以取代养儿防老来进行社会宣传,这种宣传有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抓好和抓紧。

社会养老是国家应该始终关注的一项社会工程。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体制变革等宏观社会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养老正面临着巨大压力。

本研究认为,养老要靠国家、靠集体、靠子女,但更要靠个人。投资养老的关键在于人们观念的转变,应该把金融投资养老作为一种社会风俗进行大力的宣传。金融投资养老是一种新生事物,是我国家庭理财应该重视的一项支出。金融投资养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为了金融投资养老的可接受程度,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应该对相应的金融体制的变化(诸如教育金融信贷)进行研究和提出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多少深入的探讨,研究的潜力还很大。

金融投资养老涉及风险和收益,合理的家庭养老方式应该考虑个人的心理风险承受能力,在银行储蓄、保险参与及证券投资的组合中确立理想的定位。

鸣谢:人民大学穆光宗博士和北京大学陆杰华博士对本文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作者非常感谢。

(参考文献见第64页)

历史年代所处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剖析和评价。采用了以史为据、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全书分列4篇共13章:第1篇论述中国现代人口学形成的历史渊源,包括早期随人口增长而产生的人口思想,西方资产阶级人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的传入,清末和民国时代面对“人满为患”问题不同阶级派别所持的人口观点,以及清末和民国时代与人口学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调查介绍。第2篇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初期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初步探索与正统解释,以及人口思想受当时“一边倒”政策的影响状况。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1957年初毛泽东带头谈论中国人口问题而引发的人口研究热潮。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发表及1957~1960年对马寅初的批判。第3篇反映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计划生育实践如何推动中国人口学的复苏,并最终取得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的共识,这是经过百年迂回曲折、充满苦涩的争辩和探索之后的世纪性成果。第4篇展示了中国人口学全面发展与繁荣景象。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两次人口抽样调查和若干全国性的专题抽样调查。与第1篇相应章节清末和民国时代的人口调查介绍的情况相比,真

可谓有天渊之别。此篇还就诸如人口与经济关系、生育政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容量、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学、人口史和人口思想史等专题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与评述。本书作者在最后一章中高屋建瓴,高度概括了人口研究的百年经验与教训,指出:人口研究必须实事求是,防止教条主义;研究人口问题必须加强调查,抓住实质。短短两句比较抽象又老生常谈的话语,只有那些在人口研究领域长期奉献的负责任的学者,才能领会其真正的含义和份量。

《人口学百年》是我国第一部人口学发展百年史的学术专著,资料较为详实,其中收集了不少十分可贵的学术素材,历史背景与学术观点的形成联系紧密,再加上作者的评论,可谓做到了历史、观点与评判三结合,这是写作这本书时所采纳的一种研究方法。至于说评判是否客观公正,这个问题最好交由读者自己去甄别。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至善尽美的,《人口学百年》自不例外,我想,如果能给本书主编和作者以更充分的时间,在内容上定会更加充实,会更全面反映人口学各领域的学术成就。但不管怎样,这本著作的出版问世,在人口学研究的园地里,又绽开了一朵引人注目的鲜花。

(上接第43页)

#### 参考文献:

[1] Caldwell, J. J.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N. Y.: Academic Press 1982. 28-49.

[2] 顾宝昌. 综论中国人口态势. 上海: 上海科学出版社. 1998. 79-80.

[3] Zolotukhina W. V. . The concept of Independence in Soviet and American Families. in Family: East and West, ed. by Phyllis Lan Lin et al. Volume I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Press 1992. 55-60.

[4] 广信财经快讯. 0417, 中国拟清理国有资产以偿还养老金. 2000-04-15, 广州市电信局 (clander@info.gznet.com).

[5] 新华社. 我国城市水平达到 30.9%, 网易-新闻

www.163.com, 2000-04-15.

[6] Riley, M. W. Social gerontology and the age stratification of society. In C. S. Kart and B. Manand(eds)., Aging in American. Port Washington, New York: Alfred 1976. 194-195.

[7] 冯立天. 低生育率与老年型人口. 中国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学术研讨会(人民大学), 2000-04-20.

[8] Easterlin, R. A., What will 1984 be lik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wists in age structure. Demography 15(4), 1978. 397-432.

[9] 张纯元. 人口经济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110-189.

[10] 许晓峰. 筹资与投资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1-48.